• 书评 •

书是思想文化的载体，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有的书，随便翻翻、浅尝辄止，足矣！有的书，经久耐读、愈品愈香，妙哉！

好书便是好伴侣，好书回味更悠长。或许，它曾拓展了你的视野，启迪了你的思维，让你顿生豁然开朗之感；或许，它在你忧伤的时候给你安慰，在你欢乐的时候使你的生活充满光辉；甚而，照亮了你的前程、影响了你的人生，给你留下了永久难忘的美好回忆……

——题记

此情可待成追忆

——优秀畅销书《算得快》背后的故事

尹传红

这是一本内页微微泛黄、两角已然起褶的旧书，版权页上印着：196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78 年 2 月北京第 2 版 、1978 年 2 月北京第 6 次印刷。



本文作者收藏的《算得快》书影（1978 年 2 月北京第 2 版第 6 次印刷）

这是一位跨越了漫漫路途、播撒了数学种子的“园外园丁”，在“科学的春天”到来之时及随后的岁月里，它辗转走过了 3 个家庭、哺育了 7 个孩子。

这是一份饱含真挚情意、充盈时代气息的记录。它寄寓了一位老科普作家的理想、志趣和追求，也熔铸了他行进在科普创作道路上的艰难和辛酸。

我是那 7 个孩子当中的一个。当初哪里想得到，在幸会《算得快》20 多年后，又会与它重逢，并与它的作者一家和新、旧两个版本的编辑结下了不解之缘?!

知识接力

还是从 7 年前说起吧。

2002 年 2 月，我回故乡柳州过年。到姑母家做客时，在表弟的书柜里意外地发现了我那久违了的朋友——《算得快》，不由得惊喜地叫出声来：“哇噻，我的第一本数学课外书!”

已经阔别 20 年了，眼前这本黄乎乎的小薄册泛着一股陈味，又旧又脏。可我捧着它一页一页地翻看，却感到十分亲切、温馨。只是在一瞬间，书中那 4 位倾心速算、个性鲜明的小主人公——高商、李月珍、杜小甫和王星海，又在我

收稿日期：2009−07−12
作者简介：尹传红，《大众科技报》总编辑助理兼总编室主任，主任编辑，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Email: asimov@126.com

的记忆中活跃起来……

瞧，这书的封面上写下了 2 种姓氏 5 个孩子的名字，还盖了一个印章，这是怎么回事?

最清楚个中缘由的是我的父亲尹远源。我跟他提起《算得快》，他仍还记得书的封面铺黄底，上边印着小数学迷高商的大脑袋瓜儿。当我就这本书的来历再次打电话向父亲问询时，他讲了几句后便感慨道："这是当年你们几个孩子间的知识接力啊!"

大约是在 1978 年底，父亲从报上得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新出的一本数学科普书《算得快》，很受欢迎和好评。一直怀才不遇、望子成龙心切的父亲，随即跑到城里的几家书店寻觅，但都一无所获，于是便写信向北京的亲戚求助。



刘后一为《算得快》的小读者签名的照片，刊登在 1978 年的《人民画报》上。（刘碧玛提供）

书很快就由我的表伯赵一丁寄来了，可并不是新的——在书的左上角，还写着我的表哥和表姐的名字（赵平、赵楠）。原来，《算得快》一面世就成了"抢得快"、"销得快"，北京城里竟然也脱销了——后来我听说，《算得快》早年的每次发行，两三天内便被抢购一空。

这本从北京"迁"往柳州的数学启蒙读物，一度成了我课外形影不离的"宝贝"。正是在阅读《算得快》的过程中，我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且说那一阵我跟大妹妹关系不好，老想"吃独食"，所以在书皮上就只写下我一个人的名字；还学表哥表姐注上拼音，又盖上了自己的印章。而大妹妹的名字（尹传剑），显然是由"主持公道"的父亲特意添上去的。记得，因为大妹妹用红笔在书中的插图上涂抹，我还愤怒地训斥了她……

后来，小妹妹也长大了，于是在书皮上她姐姐的名字下方，用铅笔写下了自己的尊姓大名（尹传志）——我真搞不懂那时她为什么会那么"谦虚"。

再后来，这本书又"传"给了我的两个表弟。不过，他俩并没有在书皮上留下"墨宝"。顺便说一句，这哥俩对数学很感兴趣，且都考上了名牌大学；老大还获得过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广西赛区第一名，现在德国工作……

吃了一惊

《算得快》让我记住了作者"刘后一"这个名字。

在我当年的想像中，他一定是一位知识渊博、戴着眼镜的老爷爷，兴许就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里跟陈景润做同事的老教授哩。但没过多久我就给弄糊涂了，因为父亲陆续买来的几本课外读物：《"北京人"的故事》、《山顶洞人的故事》和《半坡人的故事》，作者都是刘后一，可这几本书跟数学一点也不搭界呀?!

直觉告诉我，这些书都是同一个刘后一写的，因为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都是用故事体裁普及科学知识；故事铺陈中的人物都有比较鲜明的性格特征；再有就是语言活泼、通俗、流畅，读起来非常轻松。

一晃 10 多年过去了。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北京工作，在《科技日报》做编辑。1993 年夏的一天，一个同事指了指靠窗边坐着的一位文静的女士，悄声对我说道："她叫刘碧玛，她爸爸就是写《算得快》的刘后一。"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说我可是刘老爷子的忠实读者，前几天还在报上看到周文斌写他的一篇文章呢（《刘后一和少儿科普》，刊于 1993 年 5 月 29 日《光明日报》），真没想到我会跟他的女儿做同事!

碧玛极易相处，渐渐地我们就成了彼此熟识、信赖的朋友。她跟我讲了好些她父亲的故事。我在 20 多年前的那个猜测，总算得到了

证实。

缘分还不止于此。想不到我先后竟然又在不同的场合结识了老版（1978 年版）《算得快》的编辑郑延慧、新版《算得快》的策划编辑薛晓哲，以及早在 70 年代末就报道过刘后一科普创作成果的记者周文斌。人生可真是奇妙啊，与《算得快》相关联的这些“巧”，怎么都让我给碰上啦?

我想拜会刘老先生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留下遗憾

1996 年夏秋之间，我听说刘后一先生病了，便再次向碧玛提出去看看他老人家。几天过后，刘老先生让女儿捎来话说，谢谢我的好意，他很愿意见我，只是这一阵卧病在床，家里乱得很，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然而，此后不到半年便传来噩耗：老先生在参加科协组织的一次活动时，因脑溢血突发而匆匆离去。这一天是 1997 年 1 月 24 日。

未能见到“活生生”的刘老先生令我痛悔不已。我想，那我就去为他送行，作一下弥补吧。岂料，1 月 31 日那天上午，当我在 10 点 20 分从郊区匆匆赶到八宝山时，追悼会因故已提前半个多小时举行，没让我赶上。这样，阴差阳错，我再也见不到他老人家了!

不过，在后一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我怀着一种感恩、敬佩和找补的心情，组织、编发了有关他的大半个版的纪念文章，发表在 1998 年 1 月 27 日的《科技日报》上，这多少让我得到了一些宽慰。也正是在做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对后一先生的品格、学识和涵养，以及多年来他从事科普创作所付出的辛劳和代价，所承受的艰难和重压，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郑延慧女士告诉我，上个世纪 70 年代初她接手编辑需修改再版的《算得快》时，曾到刘后一家去过几次，发现身为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人员的他处境十分窘迫。当时他一家 5 口，挤在两间大约 8 平方米的房子里，“除了床铺，难找别的空间。他常常只能在办公室里写作到深夜，而后就睡在办公室……一家人全靠他一个人微薄的工资生活”。谁能想到，《算得快》这部累计行销逾 1 000 万册，并被译成多种文字的畅销书，以及同样也很受欢迎的《“北京人”的故事》等科普佳作，竟然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写成的呢!

在女儿刘碧玛眼中，父亲刘后一是一个胸怀大志、勤奋好学而又十分“正统”的人。他父母早逝、家境贫寒，有时连课本和练习本也买不起。寒暑假一到，他就去做商店学徒、修路工、制伞小工、家庭教师等，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他之所以获得渊博的知识并在后来能写出大量的科普作品，靠的主要是刻苦自学。

“父亲也并非‘完人’。虽然他在科普创作的天地中驰骋自如，但在现实的人际关系中却城府不深，缺乏圆滑的应变能力，这使得他与许多像入党啊、晋职啊等等好事失之交臂。”碧玛这样评价她的父亲。

与刘后一相交多年的周文斌先生，以十分赞赏的口吻称道他的这位老朋友“淡泊名利”，“有一种与世无争的超脱”，但同时又直率地指出：“我觉得这些优点的另一面即是他的弱点，那就是委屈求全，不敢据理力争，不敢当仁不让。他做了几十年的科研、学报编委和科普杂志《化石》主编的工作，写下了数十部总计 200 多万字的著作，可直到退休仍还是一个副编审。这一点，我感到不公，他的其他朋友也认为不公，而刘后一本人却忍了。这是我所深为遗憾的。”

在周文斌看来，这一遗憾的背后还有着一个更大的遗憾，那就是科普创作的被轻视。在科技界，有些人虽然对写科普作品不知从何下笔，更不了解科普创作的艰辛，可却对科普作家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狂妄。他们视科普创作为“小儿科”，对科学普及的意义更是一知半解，可却自恃高明、自以为是。这正是我们科普事业的悲哀！“真愿意我们的科普界多一些像刘后一这样的‘副编审’，也真愿意我们的科普界不再有像刘后一这样的‘副编审’。”

园外园丁

“你写了那么畅销的书，若是在我们那里，

够吃一辈子的了。”在刘后一生前，有一位外国朋友曾这样对他说。回到家后，他苦笑着跟女儿提起过这事儿。但他真的在乎他吃的“亏”吗?

碧玛告诉我，她父亲长期业余从事科普创作，耗费了巨大的精力，然而所得到的稿酬并不多，甚至“不成比例”。尽管如此，他仍经常拿出稿酬买书赠给渴求知识的青少年，还曾资助了8个“希望工程”的小学生背起书包走入学堂，并将《算得快》等书的重印稿酬全部捐赠给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编辑出版的大型丛书“希望书库”。

后一先生其实是一个豁达大度的人。在他的心目中，身外之物远远不及他所钟情的科普创作重要，因此，在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乃至刁难面前，他都能够泰然处之，而不是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他曾写道：“有的人情愿穷聊闲逛、‘打百分’，却看不惯别人业余给孩子写东西……有的人以己度人，认为你写些科普作品，无非是为了出名，得稿费而已。甚至造谣污蔑，打击陷害。在我看来，我上过师范，学过教育学，为孩子们写作，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栋梁、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也是我的正业。作为国家干部，同时又是园外园丁，有何不可，有何不妥?”

在这篇题为《园外园丁的道路》的文章中，后一先生还戏称自己当年挑灯夜战的办公室，是他“耕耘笔墨的桃花源”。字里行间也透着欢快的笔调：“《算得快》出版了，书店里，很多小学生特意来买这本书。公园里，有的孩子聚精会神地看这本书。我开始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与快乐，因为我虽然离开了教师岗位，但还是可以为孩子们服务。不是园丁，也是园丁，算得上是一个国外园丁么？我这样反问自己。”

一看就懂

当年，正是了解到一些孩子对算术学习感到吃力，后一先生才决定写一本学习速算的书。而这，跟他的古生物学专业压根就不沾边。他回忆道：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陈俊忻同志要我为孩子们写一本书，这对我倒是一件新鲜事。

“写什么呢?”

“眼下孩子们对算术学习感到费劲，能不能写一本书，诱发他们对算术的兴趣。”

我想起了在小学校给孩子们教“肚算”的情景，便决定写一本学习速算的书。怎样写呢?我带着这个问题走进了少年儿童图书馆，认识了一位老大姐，她叫陈俊慧，真巧，她是陈俊忻的姐姐。我向她说明了来意，她引我参观了架上陈列的书：故事书，翻得要破了；知识书，崭新得很。陈大姐的意思我懂了，孩子们爱看故事书，不爱看知识读物。能不能把两者结合起来，写成科学故事书呢?我的自我回答是肯定的。从此，我迈出了向科普创作道路前进的最关键的一步。

不会写，学着写。既是故事，就得有情节。情节是一件事一件事串起来的，就像动画片是一张一张画联结起来的一样，连续快放，就活动了。既是故事，就得有人物。很多小学生的形象在我脑际融会了，活跃起来了。他们各有各的爱好，各有各的性情，但都好学、向上、有礼貌、守纪律，一个个怪可爱的。

书写完了，得起个书名，有人提出《速算津梁》，未免太古雅；有人提出《怎样才能算得快?》又觉得太啰嗦。最后我决定：起名《算得快》，简单明了，一看就懂，而且合乎孩子口味。

《算得快》写于1962年。那时后一先生作为研究古生物的专家，正用数学统计的方法研究从周口店发掘出来的马化石。他敢接下这个他专业研究领域之外的活计，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兴趣。其实，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和珠算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个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曾是他的数学启蒙。他自小就向他当店员的姐夫学习打算盘，并对珠算作过一些研究。

《算得快》是通过几个小朋友的游戏、玩耍、提问、解答，将枯燥、深奥的数学问题，演绎成饶有兴趣的“儿戏”，寓教于乐，使儿童们在“乐中学”，掌握了与“儿戏”大相径庭的

速算知识或曰速算科学。数理算法，严谨科学，却没有一点艰涩和故作高深。这种教育方法，同30年后中国珠算界在少儿珠心算教学中提倡和采取的“乐中学”应该是同源同根的。这种著述和教学方法，以《算得快》多次再版和千万多册的发行量，见证着科学和普及的方向应该是什么。它也阐释了一种朴素的“方法论”思想：世界上有很多复杂的事情，往往可以用更为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和完成。

有位珠算专家曾赞叹：《算得快》让人看来懂得快，学来会得快，颇见作者功力，颇见作者苦心。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克定生前也评价说，在老版《算得快》中，今天流行的速算法几个要点都已具备。但由于考虑到读者对象，形式上采用了故事体，内容则力求精简，方法上则废除注入式，而采用启发式，以至有些特点竟不为人所注意。例如：速算从高位算起，作者在计算36＋87的时候，就是用“八三十一、七六十三”的方式来暗示的；直到第11章才通过杜老师的口说出“心算一般从前面算起”的话，又通过杜老师的手，明确采用了高位算起的方法；其他乘法进位规律、化减为加等等亦莫不如是。

后来，后一先生又对《算得快》进行了两次较大的修改，一方面是删繁就简，将一些烦琐的推导式简化了；另一方面，却又将过去说得简略的地方作了补充，使要点更加突出，内容更加丰富。但是，考虑到少儿读者的接受能力，并没有增加学习的难度，乘除法仍然以两位数乘除为主。在第二次大的修改中，除了接受读者要求有所增减外，还介绍了一些国内外速算进展情况，只要是真正有所创造、发明，而又能为少年儿童接受的，他都尽量吸收其精华，奉献给读者。

宽广胸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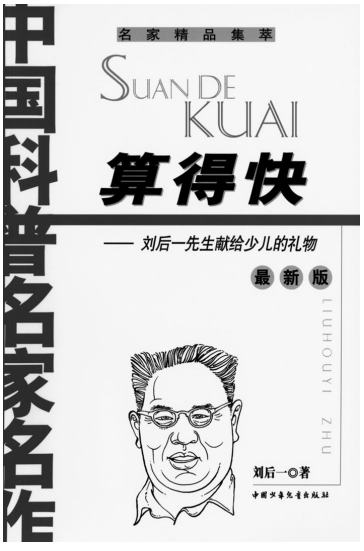
“一口清”算法，是《算得快》被中国珠算界专家们所称道的科学内涵之一。1986年的《中国珠坛》针对当时社会上有人争相表白自己是速算法的发明人时，曾公平地评价说：“‘一口清’速算法早在20多年以前刘后一就在《算得快》中向少年读者介绍了，一口清速算法是刘后一同志的发明。”但是后一先生对此却表现出极为谦虚、严谨的科学态度，他公开表明：“我没有发明快速计算法，因为其中的有些内容是老师教我的，有些则是书上看到的，有些来自民间，有些来自个人教学经验。首先这‘一口清’的名字是一位计算神速的营业员提出来的，我借用来作为速算法的通称。”他还说：“一项事业的成功，不是靠少数人，而是靠广大群众。”“速算法非少数人所得而私。”

后一先生的风骨着实令人敬重，那就是“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窘困而改节”。他引古语跟女儿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搞古生物研究的人应该胸襟宽广、达观，因为宇宙无穷大，个人一生实在太渺小了，何必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神，而况思其智之所不及，忧其力之所不能也！（大意如此）

曾几何时，社会上有过这样一种论点，认为人才有“潜”、“显”之分。“潜人才”对社会的奉献远远大于从社会中获得的回报，而“显人才”则恰恰相反。一切客观公正的人都会承认，“潜人才”这一称谓于刘后一当之无愧！

在刘后一先生7周年忌日将至的2003年12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算得快》的最新版，开机便印15 000册。半年时间不到，又加印了11 000册。不久前我向薛晓哲先生打听到，截至2009年7月，新版《算得快》已经销售了130 850册。

后一先生，我想您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新版《算得快》书影